

## 王源著作考析\*

崔文翰

香港大學中文系

王源(1648–1710)，字崑繩，號或庵，順天府大興人，是明遺民王世德(1613–1693)的次子。他出身於衰落的宦宦世家，自少便流落江、淮地區。早年意氣風發，先後跟隨梁以樟(1608–1665)和魏禧(1624–1681)學習古文，同時醉心於行軍作戰的攻守方略，矢志將來創下一番事業；中年應邀到京師協助編纂《明史》，展開幕客的生涯；晚年結識李塉(1659–1733)後，才開始接觸顏李學派의思想和著作，發覺深相契合，遂決意師從顏元(1635–1704)，並成為清初顏李學派的成員。王源一生勤於著述，未嘗鬆懈，學術領域廣博，既從事古文、詩篇的撰作，亦有經世、地理、軍事、經學等方面的作品。王源卒後，其著作大多僅收藏於家中，後人並未斥資刊刻。就算已經刊印的著作，由於數量不多，流傳不廣，致令鮮為人知，深可惋惜，同時亦增添研究其思想的難度。

王源十分重視著述，認為從事著作有兩個重要的意義：第一，從著者角度而言，每當士人在「不得志」時，「著之文章」便成為他們抒發內心感受和提出一己之見的最佳途徑。他更以為，通過著述，既可與眾好友「相砥礪」，切磋學問，更有助提升個人的學養。<sup>1</sup>第二，站在讀者角度來看，假若著述能在「前人見聞所未及」的情況下，提出新穎的見解，並對問題「有所發明辨正」，不僅能「資益來學」，亦

---

\* 筆者撰作本文時，曾到北京搜集資料，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高翔教授及該所科研處處長齊克琛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張麗娟副教授、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部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善本古籍部各職員賜助，特此致謝。又本文之初稿，承何冠彪師悉心指導，謹致謝忱。

<sup>1</sup> 王源：〈洪去蕪文集序〉，載王源：《居業堂文集》，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讀雪山房藏板本，卷一三〈序二〉，頁八上。按：本文徵引該集的資料時，除非特別注明，否則均依據此版。

可以達致「擴學者寡陋之心胸」和「造就其才以進於掩雅」的目的，讓讀者從中獲得啟發，誘導他們開創更多新學問。<sup>2</sup> 這亦正是王源「為文以自見於天下」的原因。<sup>3</sup>

誠如王源指出，「古人著書，各有其意」。<sup>4</sup> 我們在閱讀不同的著作時，確實可以尋繹出著者內在的思維世界和了解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評論。因此，若能清楚掌握王源的著作數量和流傳情況，無疑為深入探討其思想奠定堅實的基礎。遺憾的是，王源的著作歷來均無準確的記錄。一方面固然因為王源作品散佚頗為嚴重，能夠保存至今者寥寥可數；加以其現存著作的庋藏地太過分散，被誤為失傳的作品不乏其例。其次，研究者對王源著作的版本認識不多，如忽略各種版本之間在內容、篇章數目等方面存在差異。另一方面，後人記載王源的著作，不論在書名、卷數、年代、版本演變等方面均有太多分歧，使人混淆不清。有見及此，現據有關史料，嘗試對王源的著作和刊刻概況作一次全面的考查。

### 古文集——《王崑繩文集》和《居業堂文集》

王源喜歡撰作古文，尤其在得到魏禧的啟發和指導後，他撰寫古文的能力有顯著的進步，作品屢獲時人讚賞，即使「當時號為古文家者」，亦「未足與比也」，<sup>5</sup> 可見他的古文在學界中有重要的地位。王源的古文題材廣泛，既有褒貶歷史人物和評議時政之論，亦有閒抒內心感受之文；體裁眾多，文集中收錄了傳、序、墓誌銘、書信、論、說、跋、書後等各類文章。王源有兩部傳世文集，就是《王崑繩文集》和《居業堂文集》。

《王崑繩文集》是王源首部刊刻的古文集，但多年來一直鮮有學者提及。幸好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藏康熙年間刊刻《王崑繩文集》一函十冊，<sup>6</sup> 前五冊是初刻本；後五冊則是次刻本（參圖一、二），可知《王崑繩文集》曾先後刊刻兩次。本來，《王崑繩文集》中各頁的板心都刊載卷數、類目和頁數，但初刻本的卷數和頁數遭人刻意塗去，次刻本則完好無缺。在文章篇數方面，初刻本原分卷，但同樣被人刻意塗去，故後人謂不分卷，收錄文章共五十八篇；至於次刻本則有六卷，收錄文章共六十六篇。由於〈與韓觀察書〉一文見載於二書，加上初刻本的〈萬子六十序〉與次

<sup>2</sup> 〈皇華紀聞序〉，載同上注，頁五上至五下。

<sup>3</sup> 〈洪去蕪文集序〉，載同上注，頁八上。

<sup>4</sup> 〈柳邊紀略序〉，載同上注，頁四下。

<sup>5</sup> 管繩萊（1784–1839）：〈王崑繩家傳〉，載同上注，卷首，頁二上。

<sup>6</sup>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王崑繩文集》不分卷次刻六卷」條，頁554。

刻本的〈萬季野六十序〉，兩文名異而實同。因此，《王崑繩文集》初、次兩個刻本所收錄的文章加起來，共有一百二十二篇。

除了《王崑繩文集》外，王源仍有不少「未刻古文藏於家」。<sup>7</sup> 王源卒後，後人沒有加以刊刻，原因有二：一是政治問題。由於王源卒後牽涉入《南山集》案，朝廷對他的作品頗為忌諱，其後人亦不願冒險刊刻他的文集，惟有暫且藏於家中。<sup>8</sup> 二是經濟問題。雖然過往的政治忌諱在道光年間已經解除，但當時負責編刊《居業堂文集》的管繩萊「無力梓」，<sup>9</sup> 只好將此集收藏。

管繩萊，字孝逸，其曾祖母是王源子兆符（1681–1723）的女兒。<sup>10</sup> 自王氏一家絕嗣後，管家各人均十分懷念，而且每年必定會去墓前拜祭。<sup>11</sup> 由於王、管兩家關係密切，加上管繩萊酷愛王源的著作，儘管晚年經濟相當困窘，仍願意編刊《居業堂文集》。結果，管繩萊於道光十一年親自將《文集》重新編訂，交由「金陵劉文楷」的讀雪山房鐫行之後，《居業堂文集》才正式面世。<sup>12</sup>

據管繩萊所言，「〔王源〕所著《居業堂集》藏余家」；<sup>13</sup> 又謂王源著有「古文三十卷」和「詩十卷」。<sup>14</sup> 管氏一家收藏了經過初步整理的王源《居業堂集》，內裏極有可能包括文集三十卷和詩集十卷（另參下文）。因此，《居業堂集》與《居業堂文集》估計是二書。然而，礙於資料匱乏，這個說法僅屬推測，有待驗證。

道光本《居業堂文集》共二十卷，扉頁除了刊載集名外，亦有「道光辛卯刊」和「讀雪山房藏板」數字。每卷首頁均刻「大興王源崑繩氏著」、「後學管繩萊編訂」（參圖三）。集中每頁的板心刻上「居業堂文集」、卷數和頁數。《居業堂文集》卷首目錄列出二百七十三篇目，但是〈南遊詩序〉和〈毛孺人行狀〉有目無文；〈明月夜歸圖跋〉則有文無目，<sup>15</sup> 因此，集中收錄文章的確實數目是二百七十二篇。如果將《王崑繩

<sup>7</sup> 方苞（1668–1749）：〈四君子傳〉，載《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八〈傳〉，頁218。

<sup>8</sup> 有關《南山集》案的經過，詳參何冠彪：《戴名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頁253–310。

<sup>9</sup> 〈王氏塋記·附記〉，載《居業堂文集》，卷首，頁二上。

<sup>10</sup> 同上注。

<sup>11</sup> 〈王氏塋記〉，載同上注，頁一上至一下。

<sup>12</sup> 正文「金陵劉文楷」數字，見於〈原敘·附錄〉，載同上注，卷首，頁三下。另參看趙培元：〈題要〉，載《居業堂文集》，光緒五年（1879）定州王氏謙德堂刊《畿輔叢書》本，卷二〇〈附錄〉，頁二五下。

<sup>13</sup> 〈王氏塋記·附記〉，頁二上。

<sup>14</sup> 〈王崑繩家傳〉，頁二上。

<sup>15</sup> 趙培元〈題要〉指出編者「編定後續有增損」，因「目錄失檢」而遺留下這些錯誤（頁二五下至二六上）。

文集》與《居業堂文集》的篇目作一比較，不難發現《居業堂文集》少收錄《王崑繩文集》中二十二篇文章：初刻本的〈汪生傳〉、〈耶律休哥論〉、〈與韓觀察書〉、〈代家大人壽張敏公六十敘〉、〈代家大人壽喬雲漸六十敘〉、〈酣漁字說〉和〈書枯木怪名卷後〉七篇，以及次刻本的〈蔣公子傳〉、〈張孝廉傳〉、〈山東按察司經歷徐君暨馬孺人墓誌銘〉、〈與河南趙太守書〉、〈陳靜機先生詩序〉、〈張少文詩序〉、〈某友時藝序〉、〈楊曉先詩序〉、〈劉石村詩序〉、〈濟州集序〉、〈蕭氏族譜序代〉、〈壽萬涵齋太守序〉、〈程母鄭孺人七十序〉、〈送程南原序〉和〈送王大司寇給假東歸序代〉十五篇。若將兩集的文章加起來，汰除重複，共有二百九十四篇。這二十二篇文章的內容，牽涉不同的題材，有助進一步了解王源的生平和思想。無論如何，《王崑繩文集》確實可以補足《居業堂文集》的遺漏。<sup>16</sup>

## 詩集

《王崑繩詩集》一書，筆者未見，相信已經散佚。有關此集的資料，後人所知不多。據管繩萊稱，王源著有「古文三十卷」和「詩十卷」，<sup>17</sup> 又謂「《居業堂集》藏余家」。<sup>18</sup> 誠如上文的分析，《居業堂集》應是王源的詩文集，合共四十卷。然而《顏李師承記》卻記載，王源有「詩文集三十卷」，<sup>19</sup> 不知此說有何根據。據筆者推測，由於管繩萊生活困苦，無法將整套《居業堂集》付梓，只能選擇刊刻文集（《居業堂文集》），終令詩集無法面世，最後更散佚不存，誠為一大憾事。因此，無法知悉有關此書的內容。

<sup>16</sup> 有關《王崑繩文集》和《居業堂文集》二集的編刊過程和版本演變情況，見崔文翰：《〈王崑繩文集〉和《居業堂文集》：清儒王源文集編刊考釋》，《九州學林》（待刊），此處不贅。至於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指出王源於康熙四十三年為史申義《使滇集》撰序（卷一五〈黃門詩鈔十六卷〉，頁391），不確。因為撰此序者實為青浦人王原（1688年進士），見史申義（1688年進士）：《使滇集》，康熙（1662-1722）刻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王序〉，頁一上。

<sup>17</sup> 〈王崑繩家傳〉，頁二上。此亦見載於徐世昌（1858-1939）：《大清畿輔先哲傳》（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1。另外，戴望（1837-1873）《顏氏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亦謂王源有「詩十卷」（卷八〈或庵·舉人王先生源〉，頁203）。

<sup>18</sup> 〈王氏瑩記·附記〉，頁二上。

<sup>19</sup> 徐世昌：《顏李師承記》，民國十八年（1929）刻本（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年），卷一〈王崑繩〉，頁一五上。

現存王源的詩作不多，《國朝畿輔詩傳》只錄〈留別黃弼臣〉一首。<sup>20</sup>不過，筆者發現王源另有詩兩首，一是〈呈習齋先生〉，載於《顏習齋先生年譜》，後收載於《清詩匯》；<sup>21</sup>一是載於《李塉年譜》的一首，惟闕題目。<sup>22</sup>

## 經世著作

王源經常留心經世事務，關注平民百姓的生活，意欲為國家效力。可惜自從考取舉人後，他的事業發展並不如意，亦與仕途無緣，以致胸懷宏大的理想，苦無發揮的餘地，因此轉向從事經世實用之學。另外，晚明以來，政局混亂，大臣庸碌無能，政策朝令夕改，人民難有安穩的生活，終致國破家亡。其次，由於明末清初的士子長期沈醉於理學問題的爭辯，更常以理學家自詡，社會充滿著一種詐偽的風氣，既令人心渙散，不思振作；又嚴重影響國家的施政，無助上位者有效地管治國家。王源反對程朱理學，竭力彰顯經世致用的實學，亦與此有莫大關係。以下分別從總述、地理、軍事、歷史著作四方面逐一介紹王源的經世著作。

### 總述——《平書》

《平書》是王源的經世著述。據李塉記述，王源撰作此書的動機，乃因他「目睹天明之覆轍」，於是決心「追三代之善政」，在撰寫期間，「日稽夜營」，始克完成。<sup>23</sup>《平書》者，意指「平天下之書」，<sup>24</sup>乃取《大學》「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平書》的命名，反映出王源內心的經世思想。全書分「上、中、下三卷」，涉及的範圍很多，劃分

<sup>20</sup> 見陶樑(1772-1857)：《國朝畿輔詩傳》，道光十九年(1839)紅豆樹館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二五〈王源〉，頁一一下至一二上；徐世昌：《清詩匯》，1929年退耕堂本(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1996年)，卷四八〈王源〉，頁一一下。

<sup>21</sup> 李塉(編)、王源(訂)：《顏習齋先生年譜》，載《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癸未(1703)六十九歲」條，頁790；另見載於《清詩匯》，卷四八〈王源·呈習齋先生〉，頁一一下至一二上。

<sup>22</sup> 馮辰、劉調贊(1700-?)：《李塉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三「〔康熙〕癸未(1703)，四十五歲」條，頁99-100。

<sup>23</sup> 李塉：〈序〉，載王源(著)、李塉(訂)：《平書訂》，《畿輔叢書》本，卷一，頁一上。

<sup>24</sup> 〈平書序〉，載《居業堂文集》，卷一二〈序一〉，頁一二上。有關《平書》的宗旨，王源亦說：「有《平書》三卷，論平天下之法，如取士、建官、兵農、食貨之類。」見〈再與毛河右先生書〉，載《居業堂文集》，卷八〈書三〉，頁二一上。

為「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財用、河淮、刑罰和禮樂」十個方面，共有十五篇。<sup>25</sup> 在內容方面，王源大抵跟隨「三代之法」，但又「不泥其跡」，只會做到「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務求賦予現實的意義；同時，他「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以收「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熄」的效果。他又說「即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為一、二千年太平之業」，更能「復斯民於三代」。雖然他謙稱學識「未必逮」，祈望「與予同志」的「世之君子」能夠「補其不逮」，<sup>26</sup> 但他對此書無疑寄予很大期望，希望終有一

<sup>25</sup> 〈平書序〉，頁一二上。另參周家楣、繆荃孫(1844-1919)(編)：《光緒順天府志》，光緒十二年(1886)刻、十五年(1889)重印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一二五《藝文志四·順天人著述三·國朝·王源·平書》，頁6564；《顏李師承記》，卷一〈王崑繩〉，頁一四下。後人不少誤以為《平書》是十卷，如李焯：〈王子傳〉，載李焯：《恕谷後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雍正(1723-1735)刻增修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六，頁一四上至一五上(按：由於李焯《恕谷後集》至今仍未有校注本，故學界採用該集的資料時，便會各自依據不同的版本。可是，不同的版本內容有別，如《顏李遺書》〔定州王氏藏板本〕、《畿輔叢書》和《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等均刪去時人的評點。若與《續修四庫全書》本比較，則三本均遺漏了不少篇章，如〈送張少文序〉〔卷一〕、〈葉〉〔卷一一〕、〈衡水杜氏世德記〉〔卷一三〕等。即使最近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所收的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雍正刻本，因「原缺第十五葉」〔總頁137〕而缺〈衡水杜氏世德記〉一文，可知仍有闕漏。所以，本文採用《續修四庫全書》本作為依據)；李元度(1821-1887)：《國朝先正事略》(長沙：岳麓書社，1991年)，卷三〇〈王源〉，頁874；李鴻章(1823-1901)等：《光緒畿輔通志》，1934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清光緒十年(1884)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二二六〈列傳三十四·國朝一·順天府一·王源〉，頁304-5；《顏氏學記》，卷八〈或庵·舉人王先生源〉，頁202；趙爾巽(1844-1927)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八〇〈儒林傳一·王源〉，頁13132；國史館(編)：《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六六〈儒林傳上·王源〉，頁5327；徐世昌：《清儒學案》，《海王村古籍叢刊》本(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90年)，卷一一〈顏元習齋學案·習齋弟子·王先生源〉，頁三〇下；支偉成(1899-1928)：《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王源〉，頁14；張志良：〈王源〉，載錢仲聯(1908-2003)(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59；鄭吉雄：《清儒著作述評》(臺北：大安出版社，2002年)，〈王源〉，頁126。另謂《平書》有二卷，如〈四君子傳〉，頁218；〈王崑繩家傳〉，頁二上；魏一鰲(?-1692)(編)、尹會一(1691-1748)等(補)：《北學編》，清同治七年(1868)重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三〈續輯·大清·王或庵先生〉，頁二一下；皆不確。而《大清畿輔先哲傳》則誤謂《平書》有八事(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2-23)。

<sup>26</sup> 〈平書序〉，頁一二上至一二下。

天見解能夠得到實踐。可見《平書》是一本展示王源經世治國的思想，以及一系列建設理想政府的方法和政策的專著。<sup>27</sup>

至於《平書》有否獨立刊刻成書，已經無法得悉。此書不幸已經散佚，有賴李塉《平書訂》收錄了《平書》的內容，後人從《平書訂》或可以窺其大概。當王源完成《平書》後，便送交李塉論訂，<sup>28</sup>終成《平書訂》。李塉謂：「拙見載於《瘳忘編》、《學政》諸帙者，大端皆合，但予著散錄，而《平書》分門遞次，綱舉目張，脈絡貫通，可謂成矣。其中條件少有不合者，亦不敢以天下世教養之鉅而苟同也。因盡毀己著，但附拙見於各卷後，以考正之。」<sup>29</sup>李塉詳細地研讀《平書》後，將自己的意見附於各卷後，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完成《平書訂》一書。<sup>30</sup>據現存的版本可知，《平書訂》除了附有李塉的意見外，亦有惲鶴生(約1655–1743)等人的說法，可知是在李塉完成評訂後才增補進去的。雖然李塉聲稱與王源的想法相近，但實際上二人的意見多南轅北轍，甚至互相矛盾。在全書的篇目方面，書中不再將《平書》分為三卷，而是改篇為卷，共有十四卷，其中〈武備第六〉原有上、下兩篇，下篇「論步兵、騎兵、車兵、火兵、水兵、隊伍之制、器械之用、戰陣之法」，但由於李塉以為這不涉及「經制」而刪去。<sup>31</sup>儘管《平書訂》與《平書》有所不同，但因《平書訂》保留了《平書》的原文，令《平書》得以流傳至今，已算是一件幸事。

《平書訂》一書，現存《畿輔叢書》本、《顏李遺書》本和《叢書集成初編》本三個版本，三本的內容相同，分別在只有《叢書集成初編》本有斷句而已。下文將會以《畿輔叢書》本為討論的依據。另外，《續修四庫全書》亦收入《平書訂》一書，標明是「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sup>32</sup>雖然此本的內容與其他版本沒有太大分別，但明顯缺載惲鶴生的評論，不能視為足本。

《平書》的撰作，乃王源有感於晚明弊政，所以內容多與國計民生有關。它是反映王源經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典籍，也是顏李學派經濟政治思想的代表著作，價值不容忽視。

<sup>27</sup> 孫寶瑄(1874–1924)亦認為《平書》的內容「皆變法改政之語」，以為「彼時曷嘗睹今日泰西之盛，然其持論已有吻合者」。見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二十六日」條，頁919。可見他亦推崇此書。

<sup>28</sup> 《李塉年譜》，卷四「〔康熙〕丁亥(1707)，四十九歲」條，頁118。

<sup>29</sup> 李塉：《平書訂·序》，頁一上。

<sup>30</sup> 《李塉年譜》，卷四「〔康熙〕戊子(1708)，五十歲」條，頁125。

<sup>31</sup> 《平書訂》，卷九〈武備第六〉，頁六上。另參《顏李師承記》，卷一〈王崑繩〉，頁一六下。

<sup>32</sup> 王源(著)、李塉(訂)：《平書訂》，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頁首。

### 地理著作——《輿圖指掌》

王源喜歡到處遊歷，尋訪各地名勝古跡，奇景奇象，嘗謂：「山川，益我神也。」<sup>33</sup>無怪他「自畿南，由晉入秦，出潼關，下三川，而渡河北，所過山川、城邑、險要，莫不周覽詳識」。<sup>34</sup>

王源也酷愛軍事思想，對作戰陣法、遣兵調將之道有不少見解。他深知地理形勢對行軍作戰的重要性，以為「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如果行軍主帥「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荊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懵然以往也」。但是如何去了解各地的形勢呢？以往的帝王便依靠記錄各地情況的「圖籍」去掌握天下的事情，當中包括各處的地形。可是，王源認為圖籍有三個方面的缺失：一是「詳於郡邑而不詳於形勢」，令人「不知攻守之所宜」；二是「詳於今而不詳於古」，無法使人了解「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三是「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圖中「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掛、死生之不辨」，有礙掌握各地形勢的實情。因此，「圖籍之不足恃」，實令「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有鑑於此，王源決心彌補這些圖籍的不足，遂「博覽輿圖，參考互正」，「輯為一編，名曰《輿圖指掌》」。<sup>35</sup>此書可視為有關兵事的地理圖書。

在內容方面，《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另外，「九邊即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海、沿江各省總論之中」。至於「諸郡」的情況，便會「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

<sup>33</sup> 〈南游日記序〉，載《居業堂文集》，卷一三〈序二〉，頁六上。

<sup>34</sup> 〈五鎮圖誌序〉，載同上注，卷一二〈序一〉，頁一五下至一六上。雖然王源自云「恨未遠游」（〈南游日記序〉，頁六下），但在《居業堂文集》中有關王源四處遊歷的過程，可謂俯拾皆是，姑舉以下兩個例子說明：「〔源〕最愛三齊風土，行將入青、兗，登岱宗，北走燕、趙之郊，歷雲中雁門，逾河涉渭，南出武關，過荊襄，沿江而下，以游吳、楚，匡廬、彭蠡之游，其期諸異日乎？」（〈送胡心仲歸南昌序〉，載《居業堂文集》，卷一五〈贈送序一〉，頁一二下）「予往游，得異境，巖壑奇邃秀偉，藤木糾鬱，飛瀑泉澗，淙淙瑟瑟。昔杜甫訪張氏隱居，暨與劉九法、曹鄭瑕邱宴集，即其處。蓋所謂石門者也，共十三峰。屈如龍蟠，別一峰抱其中，曰涵峰」（〈送孔東塘戶部歸石門山序〉，載同書，卷一六〈贈送序二〉，頁三下）。

<sup>35</sup> 王源：〈自序〉，載王源：《輿圖指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鉛印本，頁一上至二上。此文亦見於〈輿圖指掌序〉，載《居業堂文集》，卷一二〈序一〉，頁八下至九上，而文字微有分別。另見〈與王吏部書〉，載《居業堂文集》，卷六〈書一〉，頁七上。按：《清儒學案》謂王源撰著的《輿圖指掌》是一卷本（卷一一〈顏元習齋學案·習齋弟子·王先生源〉，頁三〇），疑誤。



山川」，其他如「宮室人物」等「無關於形勢者」，均不載錄。當然，如果「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自會一併附載。他亦「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隘畫為圖，圖成方丈」，即使不能保證準確無誤，但「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簡言之，全書論「天下形勢，覈論詳矣」；談論「一方形勢」，則「一省總論詳矣」。另會將「前賢之論列於前」，自己的意見「附於後」。只要讀者「按圖稽古，斟酌考訂」，對於「攻守之宜」，自可「有一得焉」。<sup>36</sup>

不過，由於王源「未嘗周行歷覽」，而僅「求之圖籍之間」，故謙稱此書「不可恃」。<sup>37</sup>他說：「予昔著《輿圖指掌》，考天下形勢，其說詳於疆界、阨塞，為圖縱橫經丈，按說披圖，不終日而大勢洞心目，但未一一身其地，誤者必多。」<sup>38</sup>話雖如此，王源已經積極到處遊歷，探訪名山大川、江河湖泊，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勢；但天下之大，他根本不可能親身逐一訪查，如他「不能親歷三邊」，便是一顯例。<sup>39</sup>然而，王源以一己之力，嘗試勾勒天下地勢及其歷史演變概況，洵屬難得。

可惜，《輿圖指掌》一書亦罕見流傳，除了《光緒順天府志》和《大清畿輔先哲傳》說此書仍然傳世外，<sup>40</sup>後人甚少述及，甚至以為已經散佚不存。<sup>41</sup>但是，實情並非如此，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書的鉛印本（參圖四）。據此本顯示，全書不分卷，以省份為篇目，共有〈北京〉、〈南直〉、〈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十五篇。每篇敘述各地的郡邑建置沿革、封域遠近、山川形勢等內容。然而，此鉛印本與原本頗有出入，其中原委，鉛印本的〈跋〉有以下解釋：

〔《輿圖指掌》〕舊有全圖一幅，縱橫十餘尺，總論一，各省分論十有五。顧以傳抄日久，圖既不可得見，而總論亦闕焉。……而求其圖與總論者，越百里

<sup>36</sup> 〈自序〉，載《輿圖指掌》，頁二下至三上；另見〈輿圖指掌序〉，頁九下。

<sup>37</sup> 〈自序〉，載《輿圖指掌》，頁三上；另見〈輿圖指掌序〉，頁九下。

<sup>38</sup> 〈五鎮圖誌序〉，頁一五下。

<sup>39</sup> 同上注，頁一六上。

<sup>40</sup> 《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二五〈藝文志四·順天人著述三·國朝·王源·輿圖指掌〉，頁6563；《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6。

<sup>41</sup> 參Tu Lien-che (杜聯喆，1904–1994)，"Wang Yuan," in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ed. Arthur W. Hummel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vol. 2, p. 843；姜廣輝：《顏李學派》（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144，207；陳祖武：〈王源〉，載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81；姜廣輝：《走出理學：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287。

外訪之，閱月不可得。……雖其圖不可得，而讀先生之論，觀近世之圖，即可瞭然於心目；雖總論不復存，而讀先生各省分論，總論亦可想見焉。<sup>42</sup>

雖然鉛印本不是足本，但此書的發現仍然有助於研究王源的地理和軍事見解。

### 軍事著作

王源一生醉心於軍事作戰之法，「秩如兵事，尤其所長」。<sup>43</sup> 他「自幼喜談兵」，<sup>44</sup> 廣泛閱覽古代著名將領的兵書，對於兵法的運用，最為留意。這些訓練讓他每每與人「談兵」和「講究伯王大略」的時候，<sup>45</sup> 表現其豐富的軍事知識和見解。

### 《兵論》、《兵書》

有關《兵論》一書的資料，不但王源沒有交代，後人所知也甚少。管繩萊說：「桐城侍郎方苞稱其〔王源〕有……《兵論》二卷，皆不可得。」<sup>46</sup> 由此推斷，此書在道光年間已無傳本。或者，此書從未付梓；後人提及此書，多是沿襲方苞或李塉的記載，不代表他們曾經親睹此書的內容。至於王源撰寫此書的時間，戴望謂「著《兵論》三十二篇以示〔魏〕禧」，<sup>47</sup> 但從現存資料所見，只是魏禧說王源將〈項籍論〉交予他品評。<sup>48</sup> 另外，有關《兵論》的篇章數目和卷數，也有不同的記載，如管繩萊說《兵論》二卷，戴望說《兵論》三十二篇；其他的記載有說此書是三十二篇，<sup>49</sup> 有說是二卷。<sup>50</sup>

<sup>42</sup> 〈跋〉，《輿圖指掌》，頁一上至一下。

<sup>43</sup> 《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1。

<sup>44</sup> 〈兵法要略序〉，載《居業堂文集》，卷一二〈序一〉，頁一〇上。

<sup>45</sup> 〈與李中孚先生書〉，載同上注，卷七〈書二〉，頁八上。

<sup>46</sup> 〈王崑繩家傳〉，頁二上。

<sup>47</sup> 《顏氏學記》，卷八〈或庵·舉人王先生源〉，頁201。

<sup>48</sup> 魏禧：〈信芳齋文敘〉，載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收入《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八〈敘〉，頁419。

<sup>49</sup> 〈王子傳〉，頁一三上；《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1；《顏李師承記》，卷一〈王崑繩〉，頁一五上。

<sup>50</sup> 〈四君子傳〉，頁218；〈王崑繩家傳〉，頁二上；《國朝先正事略》，卷三〇〈王源〉，頁874；《光緒順天府志》，卷九九〈人物志九·先賢九·國朝·王源〉，頁4749；《北學編》，卷三〈王或庵先生〉，頁二一下；《清史列傳》，卷六六〈儒林傳上一·王源〉，頁5327；《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王源》，頁14；《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王源》，頁59；《清儒名著述評·王源》，頁126。

民國年間，《兵論》一書出版了鉛印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參圖五）。<sup>51</sup>此書不分卷，前有裴汝襄的序文。共收錄〈權論〉、〈將論〉、〈戰論〉、〈八陣論〉、〈鄭莊公論〉、〈子元論〉、〈司馬戍論〉、〈魏舒論〉、〈吳越論〉、〈龐涓論〉、〈趙勝論〉、〈項羽論〉、〈李廣論〉、〈趙充國論〉、〈鄧禹論〉、〈賈詡論〉、〈費禕論〉、〈諸葛亮論〉、〈張賓論〉、〈庾翼論〉、〈謝安論〉、〈苻堅論〉、〈唐太宗論〉、〈李密論〉、〈耶律休哥論〉、〈岳忠武王論〉、〈韓蘄王論〉、〈伯顏論〉和〈耿炳文論〉二十九篇文章。除了〈耶律休哥論〉一文見載於《王崑繩文集》外，其餘文章皆收錄於《居業堂文集》中。據裴序所講：「據先生本傳注云，兵論凡三十二篇。今所見此僅二十九，雖文集尚有佛法、老子、李陵數篇，然恐於兵學無關，故存疑以俟知者。」<sup>52</sup>可知此本尚不是足本。話雖如此，《兵論》收載的文章，正是王源探討兵學的重要材料，箇中的價值，不言而喻。

至於《光緒畿輔通志》載王源有《兵書》二卷，但不見於其他記載，疑是《兵論》的誤稱而已。<sup>53</sup>

### 《兵法要略》

此書筆者未見，相信已經散佚。<sup>54</sup>王源撰寫《兵法要略》，目的是發表自己對行軍作戰之法的見解。無疑，當敵我雙方對陣的時候，善用兵法是戰爭勝負的關鍵。他向一些「老於行陣者」詢問有關行軍排列陣式和戰時陣法，以為他們所講「與古節制之師不合」，不宜採用於今。有見及此，王源決心撰著此書，望能釐清將領對兵法的誤解。<sup>55</sup>

《兵法要略》共有「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談論「用兵之方略」，內容述及「孫子諸家之說」，但「刈其繁而存其要」；中篇則是「守壘之法」，凡有關「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等

<sup>51</sup> 見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兵論〉，頁395。此書另有清鉛印本，藏於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詳見上書，但筆者未見此本）。參看許保林：《中國兵書知見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兵論一冊〉，頁375；許保林：《中國兵書通覽》（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兵論一冊〉，頁625。

<sup>52</sup> 裴汝襄：〈序〉，載王源：《兵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鉛印本，頁二下。此條資料承陳潔儀小姐為我翻檢，謹此致謝。

<sup>53</sup> 《光緒畿輔通志》，卷二二六〈列傳三十四·國朝一·順天府一·王源〉，頁305。

<sup>54</sup> 《光緒順天府志》雖然說此書仍然傳世（卷一二五〈藝文志四·順天人著述三·國朝·王源·兵法要略〉，頁6564），但可惜今天已經不見傳本。

<sup>55</sup> 〈兵法要略序〉，頁一〇上；另參〈與王吏部書〉，載《居業堂文集》，卷六〈書一〉，頁七上。

技術和戰略，一一析述；下篇則記述「古人用兵之往事」，主要是介紹「自春秋以迄於元」的戰爭概況。<sup>56</sup> 王源將此書的內容「辟之醫」，說：「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並所以炮、燔、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sup>57</sup> 他指出，若將領能夠「通於此三者」，便可「追古名將」，而「覆野之師」的事便不會發生了。全書除分上、中、下三篇外，中篇和下篇各有補遺。原來，王源一向心儀茅元儀(1594–1640)《武備志》一書，惜「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當他撰成《兵法要略》後，「始得觀其大略」，發覺自己所著的三篇與《武備志》之意「殊不相遠」，心中「喜暗合乎前人」。雖然《武備志》詳於兵法，但王源「病其雜而不清，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將《兵法要略》「所不及載者」，「錄為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這樣，自古以來，關於「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有意「學古法者」，便可以從中「有所考鏡而得其要」。<sup>58</sup>

### 歷史著作—《前籌一得錄》

王源《前籌一得錄》一書，共有十二卷，乃探討「自周至元興夭成敗之故」。<sup>59</sup> 由於

<sup>56</sup> 〈兵法要略序〉，頁一〇上至一〇下；另參《顏李師承記》，卷一〈王崑繩〉，頁一四下至一五上。

<sup>57</sup> 〈兵法要略序〉，頁一〇下。

<sup>58</sup> 同上注。茅元儀，字止生，號石民，浙江歸安縣人，是明代傑出的學者和詩人。著述甚豐，尤以《武備志》最為著名。有關茅元儀的生平和著述，參看李昱(等)：《光緒歸安縣志》，光緒八年(1882)刻本(上海：上海書店影印，1993年)，卷三六〈人物傳四·文苑一·茅元儀〉，頁二三下至二四上；任道斌：〈茅元儀生平、著述初探〉，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三輯(蘇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39–64。《武備志》共分五門，分別是《兵訣評》十八卷、《戰略考》三十三卷、《陣練制》四十一卷、《軍資乘》五十五卷和《占度載》九十三卷，各門再分子目，每篇篇首均載有「茅子曰」的評論。茅元儀《武備志·自序》中交代撰寫此書的動機，他說：「國家自受命以來承平者二百五十載，士大夫無所寄，其精神雜出於理學聲歌、工文博物之場。……故朝野之間，莫或知兵。……故東胡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因此他撰成《武備志》，以應時代的需要。見茅元儀：〈自序〉，載《武備志》，天啟(1621–1627)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頁一上至二下。有關《武備志》的介紹，參看 Wolfgang Frank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 209；高銳(主編)：《中國軍事史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426–28；《中國兵書通覽》，頁374–83；鈕先鍾：《中國戰略思想新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370–72。

<sup>59</sup> 〈再與毛河右先生書〉，頁二一上。

此書未見傳本，可能從未付梓，後人不多記載此書，<sup>60</sup> 有關此書的資料不詳。

## 經學著述

### 《讀易通言》

《讀易通言》一書，筆者未見傳本。<sup>61</sup> 王源此書撰於康熙四十七年，時於淮安知府姚陶作幕。<sup>62</sup> 全書共有五卷，<sup>63</sup> 內容指出「〈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牴牾」，<sup>64</sup> 並進行一連串辨正的工夫，以圖重建《易》學的真實面貌。

王源對於陳搏(903-989)「竊道」之舉甚為不滿，直斥他是「聖人之賊」，因為「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之賊」。因此，他批評陳搏「偽造圖書」，假借《易》學來混淆後學的視聽，做成「孔子〔丘，前551-479〕不知，搏知之；〔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前1105〕不知，搏知之」的假象，從而「竊《易》為己有」，藉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王源對此感到萬分無奈，慨嘆陳搏「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但後學竟然「不知其為偽」，實屬可悲。有見及此，王源謙稱《讀易通言》乃是一本「不得已」之作，<sup>65</sup> 表明自己會「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為異端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sup>66</sup> 由此可見，王源希望透過《讀易通言》，矯正過往對《易經》的誤解，辨清真偽，將《易》學帶回正常的學術軌道。後人對《讀易通言》的評價甚高，以為此書與胡渭的《易圖明辨》暗合。<sup>67</sup> 可惜此書已經散佚，無法進行詳細的探討。

<sup>60</sup> 見《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1；《顏李師承記》，卷一〈王崑繩〉，頁一四下。

<sup>61</sup> 《光緒順天府志》雖謂此書仍然傳世(卷一二五〈藝文志四·順天人著述三·國朝·王源·讀易通言〉，頁6562-63)，但今天已不見此書流傳。

<sup>62</sup> 〈王子傳〉，頁一五上(李塉稱此書為《學易通言》)；《顏氏學記》，卷八〈或庵·舉人王先生源〉，頁203。

<sup>63</sup> 姜廣輝誤以為此書是六卷(《顏李學派》，頁145, 207；《走出理學》，頁288)。

<sup>64</sup> 見〈王子傳〉，頁一五上。另參《清儒學案》，卷一一〈習齋學案·習齋弟子·王先生源〉，頁三〇下；《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1；《顏李師承記》，卷一〈王崑繩〉，頁一七下。

<sup>65</sup> 〈讀易通言序〉，載《居業堂文集》，卷一二〈序一〉，頁一二下至一三上。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自少好讀《易經》，「手不釋卷」，又喜好玄黃之術，著有《易龍圖》、《玄指篇》、《河洛理數》等書。有關詳情，見脫脫(1313-1355)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五七〈隱逸傳上·陳搏〉，頁13420-22。

<sup>66</sup> 《李塉年譜》，卷四「〔康熙〕己丑(1709)，五十一歲」條，頁135。

<sup>67</sup> 《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二五〈藝文志四·順天人著述三·國朝·王源·讀易通言〉，〔下轉頁364〕

## 《易傳》

筆者至今未見《易傳》一書，無法確考此書的內容和編纂過程，但《易傳》會否是《讀易通言》的別稱呢？這個假設也不能成立，原因有二：一是卷數方面。《易傳》有十卷，<sup>68</sup>《讀易通言》則有五卷。二是存佚方面。據管繩萊於道光十一年撰〈王崑繩家傳〉，「《易傳》十卷……皆不可得」，<sup>69</sup>但據《光緒順天府志》則記載《讀易通言》五卷依然傳世。<sup>70</sup>因此，筆者估計二書的內容應有不同。當然，礙於二書已經散佚，後人不可能親睹，亦無法對二書作進一步的考訂。

## 文章評點

### 《文章練要》

王源撰著《文章練要》與其性格和嗜學的興趣有密切關係。王源自稱「性尤好古」，年少時便已經「手不停披」，中年更「窮年兀兀，惟在搜羅載藉〔籍〕，評註簡編」。他首先「取六宗之首左氏」和「百家之首《公》、《穀》」，「三傳細加發明」，「更名集曰《文章練要》」，「梓以行世」。到了晚年，他「既批孟子，而後尤酷愛莊子」，決定「詳為註釋」。<sup>71</sup>經過多年的努力，王源雖然無法完成整套《文章練要》，但最終評訂了《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孟子》和《莊子》諸書。

有關此書的內容，據王源後學程城(1688–1744)的記載，全書共分「六宗」和「百家」。所謂「六宗」，即指《左傳》、《孟子》、《莊子》、《楚辭》、《戰國策》和《史記》；

---

〔上接頁363〕

頁6562–63。另參《顏李學派》，頁145；《走出理學》，頁288。有關胡渭《易學明辨》的論辨內容，詳參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頁114–20；鄭吉雄：〈《易圖明辨》與儒道之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7期（2000年9月），頁431–65。

<sup>68</sup> 〈四君子傳〉，頁218；〈王崑繩家傳〉，頁二上；《國朝先正事略》，卷三〇〈王源〉，頁874；《光緒順天府志》，卷九九〈人物志九·先賢九·國朝·王源〉，頁4749；《光緒畿輔通志》，卷一三三〈略八十八·藝文一·經部·易傳十卷〉，頁528；同書，卷二二六〈列傳三十四·國朝一·順天府一·王源〉，頁305；《北學編》，卷三〈王或庵先生〉，頁二一下；《清史列傳》，卷六六〈儒林傳上一·王源〉，頁5327；《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王源》，頁14。

<sup>69</sup> 〈王崑繩家傳〉，頁二上；《清儒名著述評·王源》，頁126。

<sup>70</sup> 《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二五〈藝文志四·順天人著述三·國朝·王源·讀易通言〉，頁6562–63。

<sup>71</sup> 王匡(1714–?)：〈跋〉，載《莊子評》，收入《孟莊合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雍正八年(1730)居業堂藏板本，頁三上。按：王匡，字方度，是王源之孫、王兆符之子，亦是

〔下轉頁365〕

所謂「百家」，則共分三類：首類是《公羊傳》、《穀梁傳》、《管子》、《韓非子》等諸家；次類是指《漢書》以下諸史；最後一類是指「漢、魏諸名家集」。至於「六朝而下」的文集則不予選評。王源認為「六經者，文之祖；六宗者，別子為祖，而各立門戶以為宗」，因此「百家不能出六宗範圍，六宗不能出六經範圍」，從此可以理解王源選錄這些文章的原因。至於全書的評訂準則，王源務求「簡練精要」，立一凡例「以為規矩準繩」，內裏會「詳而說之，以盡乎文之變」和「變而通之，盡乎神也」，致力探究「一陰一陽不可測之道」。<sup>72</sup>

此書編纂的過程，程城沒有詳細交代，只謂自己「幸得觀《文章練要》于先生」，便有意「公之天下」，惜「全書浩繁未能梓」，故「先刊其《左傳》十卷行世」。王源「不惜舉宇宙之奧以示人」，力求揭示文章的內蘊，程城對此深表佩服，更謙稱不敢「秘以自私，而不以公之天下」。他亦深信後人若將此書與茅坤（1512-1601）、孫鑛（1542-1613）諸家相較，高下互見。他原本計劃刊刻《左傳評》後，「將與同志盡刊六宗，并百家之全」，望能「使斯道煥然光昭乎古今」。<sup>73</sup> 由此可知，王源擬先將《左傳評》刊刻面世，而其他部份則陸續出版。可惜，由於王源遽然離世，《文章練要》未及完成，後人只把完成評訂的《公羊傳評》、《穀梁傳評》、《孟子評》和《莊子評》分別刊刻。結果，《文章練要》全書的出版計劃無法實踐。

〔上接頁364〕

「同年庶吉士宜興縣吳申錫諱端升公婿」。見蔣衡（1672-1743）：〈王隆川行狀〉，載蔣衡：《拙存堂文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1736-1796）間刻本，卷六，頁九〇下。有關王匡的生年，據他為《莊子評》一書撰跋時透露：「〔雍正〕庚戌〔八年，1730〕，匡年十六。」（頁三上）至於陳祖武《清代人物傳稿·王源》以為「王源子兆符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中進士後，旋即病故絕嗣」（頁281），不確。

<sup>72</sup> 程城：〈文章練要序〉，載王源：《左傳評（十卷）、公羊傳（不分卷）、穀梁傳（不分卷）》，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居業堂刻本及大連市圖書館藏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1997年），頁一上至一下。另見載於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文學類·王崑繩評訂文章練要〉，頁3891。按：程城，字風衣或豐伊，號水南，後更名嗣立，安徽歙縣人，生於康熙三十七年（1688），卒於乾隆九年（1744），享年五十七歲。少為諸生，貢太學。及後，朝廷詔舉博學鴻詞科，他「辭弗就」。著有《水南先生遺稿》、《復齋詩稿》等書。有關他的生平，參看程晉芳（1718-1784）：〈水南先生墓誌銘〉，載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嘉慶二十五年（1820）冀蘭泰吳鳴捷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六，頁一三上至一四下。

<sup>73</sup> 程城：〈文章練要序〉，頁一下至二上。有關茅坤的生平，參看張廷玉（1672-1755）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八七〈文苑傳三·茅坤〉，頁7374-75。至於孫鑛的生平，《明史》無專傳，僅知他是孫鑛之子，以及著有《今文選》十二卷（見《明史》，卷二二四〈孫鑛傳〉，頁5893；卷九九〈藝文志四〉，頁2495）。

另外，有關此書的卷數問題，後人並不清楚，如《文獻徵存錄》、《大清畿輔先哲傳》和《顏李師承記》均謂《文章練要》有「若干卷」，顯示他們不詳其數。<sup>74</sup> 鄭吉雄以為《文章練要》有十四卷，<sup>75</sup> 不知有何根據。誠如以上所述，《文章練要》根本還未完成，所謂《文章練要》的「卷數」，僅屬《或庵評春秋三傳》的卷數而已，後人不可能知悉此書的原貌和卷數。

雖然《文章練要》未見傳世，但其中《左傳評》、《公羊傳評》、《穀梁傳評》、《孟子評》和《莊子評》因先後付梓而得以保留至今。以下逐一介紹這五部著作，以窺見《文章練要》一書的性質。

### 《或庵評春秋三傳》、《左傳評》

王源所撰《左傳評》、《公羊傳評》和《穀梁傳評》三書，後人合稱為《或庵評春秋三傳》。《左傳評》首先刊行，其餘二書則相繼面世，不是同時刊刻的。有關三書的刊刻時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謂《左傳評》於康熙年間由居業堂刊刻；而《公羊傳評》和《穀梁傳評》則於康熙五十五年刊刻。下文的討論將會以此本為依據。

先談《左傳評》。此書共有十卷，分一百四十三篇，由程城負責統籌刊刻。據蔣衡〈王隆川行狀〉的記載，「當或庵公病劇時，君奉命在吳下經理所刻左傳」，<sup>76</sup> 可知《左傳評》在王源生前便開始刊刻，惜未及完成，王源便已離世。

王源〈左傳評序〉說他自「幼讀《左氏傳》」，以為《左傳》的優點絕不僅是「美句字」而已。但當他「讀諸家評」後，發現他們只集中褒揚《左傳》在「句字」方面的運用，內容千篇一律。他對此表示懷疑，指出古人的著作，後人「百千其狀不可名，百千其意不可辨」，不但把文中的原意「倒之、顛之、錯之、錯之、綜之、離之、亂之」，更會誤解詞義，「紛紜繆戾」，混淆後人的理解。或者，這正是王源深入研讀和評訂《左傳》的動機。王源閱讀《左傳》時，態度認真，他說：「吾于左氏不得其意者思之；思之不得，又重思之。得一意焉，以為是矣，非也；又得一意焉，以為是矣，又非也。何以知其非也？不能貫也。廢食寢，累日夜，忽得一意焉，曰：是矣！反覆思之，曰：是矣！何以知其是也？曰：貫矣！」<sup>77</sup> 為了嘗試破解《左傳》所隱含的意蘊和揭示古人的精神面目，王源細心分析全文，終能融會貫通，自信

<sup>74</sup> 錢林 (1762–1828)：《文獻徵存錄》，咸豐八年 (1858) 有嘉樹軒藏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一〈王源〉，頁一〇二下；《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6；《顏李師承記》，卷一〈王崑繩〉，頁一七下。

<sup>75</sup> 《清儒名著述評·王源》，頁125。

<sup>76</sup> 〈王隆川行狀〉，頁八九上。另參看戴廷杰 (Pierre-Henri Durand)：《戴名世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一一「〔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1710)」條，頁819–20。

<sup>77</sup> 王源：〈左傳評序〉，載《左傳評》，頁一上至一下。



已達到「光明瑩徹，宵冥洞達，引伸觸類，久之如登九霄觀日月，如置身六合外指點造化之跡」的境地。<sup>78</sup>雖然如此，他仍謙稱自己的細評「有負良工苦心，微言妙緒」，實「不能盡敢謂其蘊之無遺」。<sup>79</sup>

《左傳評》的評訂準則，主要分三方面：首先，在章法方面，王源指出《左傳》「無分題」，「無分篇之體」，後人常以「經為題」，「無經即以其事為題」，然而，「欲論文必分篇」，才使「章法易見」，惜後人「不論章法而概以一事為一段」，實屬「不知文」之舉。他「不與時本同」，劃分篇章「以章法為斷」。其次，在評文內容方面，由於「左氏之不合經義」的地方，「先儒駁之詳矣」，故他「皆不論」，而只集中「論文」。另外，王源對於「俗儒之論」均「不取」，因為不少人誤將「事之善即認為文之善」，但這實際上是「不知文之善，有在事中者，有不在事中者」的表現。因此，王源所作的評語堅持「知其意而後知其章法，知其章法而後知其文之所以妙」，絕不循「近代作者論者」，「字句求之」的「陋習」，更援引「名賢之見」，以資讀者參考。總之，全書評訂《左傳》「不求之字句間」，僅致力揭示「古人真面目、真精神而已」。最後，在評文符號運用方面，王源分別從「文」、「段落」、「序事」、「詞語」、「句法」和「字法」等方面作出評訂，利用各式各樣的符號，如大圈、大畫、半畫、聯虛點、單虛點、聯圈、單圈、聯點、單點等，將精彩處一一標示出來，令讀者一目了然。<sup>80</sup>

書中板心除了刻上「文章練要」四字外，各頁均刻「六宗」、卷數、頁數。而每卷的卷首均刻「大興王源評訂」、「潁州甯世簪、桐城戴名世同閱」和「歙縣程城參正」。由此可見，《左傳評》屬於《文章練要》的一部份，而此書經過王源好友的審讀和給予意見，最終才由程城刊刻，可算是合眾人之力而成。<sup>81</sup>

至於《公羊傳評》和《穀梁傳評》二書，形式和評訂的準則大致上與《左傳評》沒有明顯分別。二書皆不分卷，且缺扉頁。每頁板心只刻「公羊傳」或「穀梁傳」，並附上頁數，其他資料一概不載。《公羊傳》有四十篇，《穀梁傳》有三十八篇。

<sup>78</sup> 同上注，頁一下至二上。

<sup>79</sup> 王源：〈左傳評凡例〉，載同上注，頁二下。

<sup>80</sup> 同上注，頁一上至三上。

<sup>81</sup> 《清稗類鈔》，〈文學類·王崑繩評訂文章練要〉，頁3891。甯世簪，字筆公，潁州人，「能文工書」，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擔任翰林編修。有關甯世簪的生平概況，參看王歙福：《乾隆潁州府志》，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1998年)，卷八〈人物志·國朝·甯世簪〉，頁一〇〇下。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號憂庵，安徽桐城人，晚年曾一度隱居於南山，世稱南山先生，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年少到處遊歷，以賣文為生。康熙四十八年，考獲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二，授翰林編修。兩年後，因《南山集》被御史趙申喬(1644-1720)參奏而身陷囹圄。康熙五十二年被殺，終年六十一歲。他著有不少作品，惜大多  
〔下轉頁368〕

《公羊傳評》和《穀梁傳評》二書的出版，由程城的外甥程茂促成。自從《左傳評》面世，程茂讀後，十分佩服。他本欲得王源「所評六宗百家之全讀之」，但王源說：「余評之素矣，然未得間鮮成書也。」未幾，王源逝世。王兆符將父親「《公》、《穀》評本」給予程茂。程茂閱後，以為「《公》、《穀》之神，傳之如斯」，遂仿效其叔程城的做法，「復刊此本」，兼「述先生之言弁之」，以便讀者先「讀六宗百家之首」，然後以「六宗百家旁而通之」。<sup>82</sup>意即除了研讀《左傳評》外，他們亦可參考《公羊傳評》和《穀梁傳評》，把三書相互比較，這將有助深入了解三傳為文的精神義蘊。

至於《或庵評春秋三傳》的卷數，歷來的記載差異甚大，或以為「無卷數」，<sup>83</sup>或以為三卷，<sup>84</sup>但皆不確。據現存版本可知，《左傳評》共有十卷，而《公羊傳評》和《穀梁傳評》則沒有分卷。至於此書的名稱，有些稱為《春秋》三卷，<sup>85</sup>未免過簡，易生混淆。

最後，《或庵評春秋三傳》的版本，後人所知不多。《公羊傳評》和《穀梁傳評》流傳甚少，幾被遺忘，只有《左傳評》一書較為後人認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乾

〔上接頁367〕

被清廷禁燬，現存有《南山集》、《子遺錄》、《四書朱子大全》等。有關他的事蹟，詳參蕭穆(1835–1904)：〈戴憂庵先生事略〉，載蕭穆：《敬孚類稿》(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卷一〇〈傳〉，頁274–86；馬其昶(1855–1930)：《桐城耆舊傳》(合肥：黃山書社，1990年)，〈戴南山先生傳〉，頁296–301；《戴名世研究》，頁25–57。

<sup>82</sup> 程茂：〈序〉，載《公羊傳》不分卷、《穀梁傳》不分卷，頁一上至二上。撰序的時間是康熙丙申(四十三年)九月，但此書則刻於康熙五十五年。二者相差的時間頗長，原因無法知悉。程茂，字蕙江，新安人，「生而岐嶷」，且「好讀書」，不論「九經、諸史、漢、唐、宋以來詩文名集」，皆能「窮覽鉤貫」，文章頗獲重視，卒年六十九，著有《吟暉樓遺文》三卷、《晚甘閣詩》六卷等。詳參程晉芳：〈晚甘先生傳〉，載《勉行堂文集》，卷六，頁三上至四上。

<sup>83</sup> 永瑢(1744–1790)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三一〈經部·春秋類存目二·或庵評春秋三傳(無卷數)〉，頁256；嵇璜(1711–1794)：《清朝文獻通考》，《國學基本叢書·十通》本(臺北：新興書局，1965年)，卷二一五〈經籍五·經·春秋·或庵評春秋三傳(無卷數)〉，頁6787。

<sup>84</sup> 《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二五〈藝文志四·順天人著述三·國朝·或庵評春秋(三傳)〉，頁6563；《光緒畿輔叢書》，卷一三三〈略八十八·藝文一·經部·或庵評春秋三傳〉，頁543；《清史列傳》，卷六六〈儒林傳上一·王源〉，頁5327；《清儒學案》，卷一一〈習齋學案·習齋弟子·王先生源〉，頁三〇下；Tu Lien-che, "Wang Yuan," p. 843。

<sup>85</sup>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〇〈王源〉，頁874；《光緒畿輔叢書》，卷二二六〈列傳三十四·國朝一·順天府一·王源〉，頁305；穆彰阿(1782–1856)、潘錫恩(1811年進士)(編)：《大天一統志》，《四部叢刊續編》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卷一〇〈順天府五·人物，本朝·王源〉，頁三〇上；《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6。

隆九年重鑄的《文章練要左傳真本》(參圖六)。此書扉頁刻「王或庵手訂」、「乾隆九年重鑄」和「居業堂梓行」數字。卷首同樣有程城〈文章練要序〉、王源〈左傳評序〉和〈左傳評凡例〉。全書與康熙的版本沒有明顯的分別，僅是翻印康熙本而已。此外有宣統二年(1910)周宏蔭鈔《左傳評》，內容大致上與康熙本沒有分別，卷首只錄李剛己〈左傳評序〉、王源〈左傳評凡例〉，以及方苞〈王崑繩傳(四君子傳之一)〉一文，程城和王源的序言未見收載。據李剛己的序言指出：「周子樾宏蔭與家有內外姻連，少從予問文法，嘗歎其才高而志遠，以近日古學之日衰，深以斯文廢墜憂，爰取大興王或庵先生所評點左氏傳，印而行之，以牖迪初學，并屬剛己為之序。」<sup>86</sup>可知周氏對此書的刊行抱著一定的期望，便是重振古學的衰落。他既然以為「左氏之書，惟方望溪氏評點為最精」，但為何仍然刊行《左傳評》呢？據李剛己解釋，「或庵……平生師友如魏叔子輩，亦皆以撰著知名，其於文事，蓋有淵源」。即使此書「未能方駕望溪」，但「學者誠潛心挈讀」，便可對「於左氏為文義法」，「闡見其端緒」。加上，「左氏在古書為最難讀」，故「左氏明而他書無難類推」，可知《左傳評》實能「裨益後學」。<sup>87</sup>由此可見，王源《左傳評》一書的價值，頗獲後人認同。此書已於1979年由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翻印出版。

#### 《孟子評》、《莊子評》(或名《孟莊合刻》)

《孟子評》和《莊子評》二書，鮮為人所知(另參表一)。<sup>88</sup>幸好，中國國家圖書館皮藏雍正八年(1730)居業堂藏板本，二書才不致湮沒。中國國家圖書館稱二書為《孟莊合刻》，或因扉頁有此四字而命名。扉頁刻有「孟莊合刻」、「王或庵先生評訂」、「翻刻必究」和「居業堂藏板」等字(參圖七)，板心書題均作「文章練要」，而每頁板心刻上「六宗」、「孟子」或「莊子」、卷數和頁數。

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孟莊合刻》藏本不是獨立刊行的，因為《孟子評》共有四卷，始於卷十一，迄於卷十四；《莊子評》則共有六卷，承接《孟子評》的卷數，始於卷

<sup>86</sup> 李剛己：〈左傳評序〉，載王崑繩：《左傳評》，宣統庚戌(二年)刻本(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影印，1979年)，頁二上。

<sup>87</sup> 同上注。原文亦誤謂王源「從望溪游」，因為王源子兆符才跟隨方苞游歷和學習，見〈王生墓誌銘〉，載《方苞集》，卷一〇〈墓誌銘〉，頁254；〈王隆川行狀〉，頁八八上。

<sup>88</sup> 後人記載《孟子評》一書不多，僅見於《國朝先正事略》，卷三〇〈王源〉，頁874；《光緒畿輔叢書》，卷二二六〈列傳三十四·國朝一·順天府一·王源〉，頁305；《大清一統志》，卷一〇〈順天府五·人物·本朝·王源〉，頁三〇上；《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六〈師儒傳七·王源〉，頁526。至於《莊子評》六卷一書，更不為後人注意。據筆者所見，僅有《清儒名著述評》一書載錄(〈王源〉，頁125)。

十五，迄於卷二十。明顯地，《孟子評》和《莊子評》二書的卷數賡續自《文章練要》六宗之首《左傳評》十卷以後。由於二書流傳不廣，後人不易獲睹，故將二書的卷目詳列於表一，以資參考。

從表一可知，《孟子評》和《莊子評》並非將《孟子》和《莊子》二書內容全部作一次評訂，而是有所選擇的。

另外，《孟子評》各卷和《莊子評》首四卷的卷首均刻有「大興王源評訂」、「男兆符參閱」和「孫男匡同較」等字(參圖七)。然而，除了王匡外，校對者的名字應該還有另一人，不知何故被人刻意塗去。至於《莊子評》卷十九和卷二十的卷首，則刻上「大興王源述評」、「婿同校」和「男匡參閱」等字，當中亦有一些名字被人塗去。

至於二書的刊刻過程，主要由王源子兆符、孫匡負責統籌和安排。康熙四十九年，王源完成《孟子評》一書，而《莊子評》則僅完成內篇，「外篇未畢」，便「遽焉溘

表一：《孟子評》和《莊子評》的卷目

卷數 / 書名	《孟子評》	《莊子評》		
卷11	〈梁惠王章句上〉(全錄)	卷15	內篇	〈逍遙遊〉
	〈梁惠王章句下〉(錄五章)			〈齊物論〉
卷12	〈公孫丑章句上〉(錄五章)	卷16		〈養生主〉
	〈公孫丑章句下〉(錄二章)			〈人間世〉
	〈滕文公章句上〉(錄三章)			〈德充符〉
卷13	〈滕文公章句下〉(錄六章)	卷17		〈大宗師〉
	〈離婁章句上〉(錄六章)		〈應帝王〉	
	〈離婁章句下〉(錄六章)		〈駢拇〉	
卷14	〈萬章章句上〉(錄七章)	卷18	外篇	〈馬蹄〉
	〈萬章章句下〉(錄三章)			〈胠篋〉
	〈告子章句上〉(錄十章)			〈在宥〉
	〈告子章句下〉(錄六章)			〈秋水〉
	〈盡心章句〉(上錄五章，下錄二章)			卷19
	〈四子方〉			
	〈知北遊〉			
		卷20	雜篇	〈徐无鬼〉
	〈則陽〉			
	〈寓言〉			

逝」。<sup>89</sup> 王兆符生前打算將《莊子評》「付之剞劂」，惜「齋志以沒」。當時，王匡仍「在襁褓喁喁無知」，致令「祖父積世之勤湮沒巾笥十有餘載」。直至雍正八年，時王匡十六歲，「從師指授經書」，盡讀家中的藏書，並以「所選《莊子》一書未刻為歎」。他深知「文章必公諸天下」，加上「左氏、《公》、《穀》已風行內，家絃戶誦」，遂令他有意刊刻《莊子評》一書。他覺得此舉不僅令「先世之志藉此獲伸」，亦有助「四方之士舉一反三，讀古有得，庶幾為臨文之一助」。<sup>90</sup> 同年，王匡「先刻所選莊子文若干篇」。無奈，當時「囊資已竭」，他「深以孟子一宗不能並梓為憾」。姐丈申志綸以為此書是「千載不傳之秘」，遂決定「助付剞劂」。<sup>91</sup> 在這樣的困難下，二書得以付梓傳世。而王匡「務欲發祖父幽光」，「將其未刻諸書，并付剞劂」的孝行，也受到時人讚賞。<sup>92</sup>

討論過二書的刊刻過程後，以下分析二書的內容。現先分析《孟子評》。王源推崇孟子，以為「自周、孔以後」，能夠堅守為文之道的只有「孟子一人而已」。他眼見「近代儒書」有不少弊端，「辨不足以服人，文不足以名世」，長此下去，只會令「聖道埋沒于煙塵泥土之中」。王源認為士人閱讀「孟子之文」，必須「積學深思」和「簡練而揣摩之」，自可「心知其意」。王源深信自己「獨得其立言之意」，遂「不憚勤勞」，嘗試「為之條分縷析，提要鉤玄」，並將《孟子》「與《左傳》等書並列為宗」。王匡對此書甚為讚賞，說「幸得或庵公重加選擇，詳為論次，發眉山〔蘇軾，1037-1101〕所未發，非斯世不可少之書哉！刊行之日，必如景星鳳凰之始見也，人爭先睹之為快」，<sup>93</sup> 可見他對此書抱著很大期望。

《孟子評》一書的評訂和甄選的準則，與《左傳評》無異。據王匡〈孟子評凡例〉說，「七篇中或節抄數章或全錄一第選擇最精，先王父〔王源〕曾云：『實有心得妙而後入選，非漫然也。』其佳處或在結構、或在情詞、或在議論，皆為拈出，嘉惠後學」。<sup>94</sup> 雖然「朱註醇粹無疵，舉世宗之已久」，但是「此書論文元〔原〕非論理，惟與評語相發明者輒入」，又或者「文義難知必備註而後曉然」，亦會備載。另外，坊間有蘇軾《孟子》批本行世，每當王源採摘其內容時，必會著明，「不肯竊為己有」。<sup>95</sup>

<sup>89</sup> 王兆符：〈跋〉，載《莊子評》，頁一上。

<sup>90</sup> 王匡：〈跋〉，載同上注，頁二下至三上。

<sup>91</sup> 王匡：〈跋〉，載《孟子評》，頁二下。

<sup>92</sup> 〈跋〉，載《莊子評》，頁二下。按：此跋缺載著者姓名。

<sup>93</sup> 王匡：〈孟子評序〉，載《孟子評》，頁二上至二下。

<sup>94</sup> 王匡：〈孟子評凡例〉，載同上注，頁一下。

<sup>95</sup> 同上注，頁一上。

至於《莊子評》一書，成書過程較為複雜，王源生前僅完成內篇而已。王兆符深知自己學養「荒陋」，不「足以繼先人之志」，又說：「天地陰陽之奧，余曷能窮乎？」話雖如此，他亦「不敢墜先人之緒」，加上好友的鼓勵，於是便「補先人所未遑為」，增補「外篇、雜篇補評六篇于後，合為六卷」。<sup>96</sup>及後，王匡亦在「祖父所未評者」，「或為之續評」。所以，《莊子評》一書是「更三人之手，合三世之力」，才能「流佈人間」。<sup>97</sup>

《莊子評》的「選文與評語鉤畫之例」，亦與《左傳評》無異。據〈莊子評凡例〉說，「解句義以郭〔象，？-312〕註為主參之；音義若他家之說知者，亦間引入；其不知與無書可考者，則不能載，非盡以其解說為不當也」。<sup>98</sup>王源評訂《莊子》，目的是「明暢古人之旨，以與天下後世共之而已」。但近代士人「往往以意見論古人之文，概以人之說為不善」，王源對此不認同，表明自己「說之出于己與出于人一也」的觀點。況且，王源亦謂此書不在於「論其說之是非」，僅集中於「論文」之恰當與否。還有，由於《莊子·齊物論》屬「至難讀之文」，故王源「標畫略繁」，以便讀者「透徹融貫于中，而心解其妙」，易於掌握。至於《莊子評》的外篇和雜篇，出自王兆符之手，他亦表明「立意皆不出內篇範圍」。王兆符認為雖然外篇、雜篇之文與內篇相較難免遜色，但仍有「啟迪後學」的價值。<sup>99</sup>

時人對《莊子評》有很高的評價，如程城研讀《左傳評》後，深表讚賞，便「要求所評莊子讀之」，覺此書「辨其陰陽正變與《左傳》無二」，於是主張將此書刊行，「以公諸天下後世之有同心者」。<sup>100</sup>又如汪越「讀之」，亦「歎為自有莊子以來始得見真面目」；「好學能文士」孫于涵「讀《莊子評》」後，亦心「有深契」，鼓勵王兆符將書刊行。<sup>101</sup>

總之，《文章練要》一書多獲好評，雖然有人目之為無聊之批評，但《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則不同意此說。<sup>102</sup>《清稗類鈔》雖指王源「以評文之法，評經書及史子集，雖不脫明人積習」，但認為其書「語中肯綮，津逮後乎」。<sup>103</sup>

<sup>96</sup> 王兆符：〈跋〉，載《莊子評》，頁一下。

<sup>97</sup> 〈跋〉，載同上注，頁二上至二下。

<sup>98</sup> 王兆符：〈莊子評凡例〉，頁一下。

<sup>99</sup> 同上注，頁一上至二下。

<sup>100</sup> 程城：〈莊子評序〉，載《莊子評》，頁二上。

<sup>101</sup> 王兆符：〈跋〉，載《莊子評》，頁一下。

<sup>102</sup>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王源》，頁14。

<sup>103</sup> 《清稗類鈔》，〈文學類·王崑繩評訂文章練要〉，頁3890-91。

## 譜牒

王源《家譜》今不見傳本，應已失傳。<sup>104</sup> 雖然如此，此譜確曾傳世，據呂履恆（1694年進士）〈王氏家譜序〉一文所載，他曾「讀王氏家譜」，而該譜更是「撰於公〔王世德〕次子崑繩」，<sup>105</sup> 可惜此譜燬於戰火中。<sup>106</sup>

根據王源的說法，此譜撰於康熙四十二年。他認為「尊祖故敬宗，敬宗教收族」，故當「宗法夭」時，「族譜」便有很大的功用。所以，他「勉為之譜」，目的是「明其所自來，而收族以傳於後」。本來，王氏一族在明末時期可謂「盛極」一時。可惜，「甲申之禍」後，國破家亡，自此「宗族流亡」，祖宗「幾不享其禋祀，而子孫日以陵夷衰微」。王源「年方壯」，「忼慷憤發」，常「思以功名顯」，但最終「潦倒四十餘年，卒以老死無所就」。有見及此，他更覺得自己應該記錄王氏一族的歷史，希望「子孫見此譜」，亦能「惕然祖宗積累之遠」和「後代之凋零瑣尾」，並且「相與勉為忠孝，立德立功，讀書力學」，使個人的「德行、事業、文章卓卓然光昭朝野，寢昌寢熾，以至於蕃衍盈升」，藉以「復祖宗之業，大王氏之門」。加以王源指出，自己「上念祖父之遺緒，下念子孫之紹述，承先啟後」，編修《家譜》一事，實在責無旁貸。當然，王源獨力編纂這本家譜亦碰到不少問題，如「老成既喪，無所考」，只能「徒就其所聞者序之」，當中「遺者不知其幾」，僅在「七世中」便「不滿三十人」，「存者不過七、八人」而已。<sup>107</sup> 雖然如此，他仍盡力完成這項工作。

## 審訂他人著作

### 《梁鷓林先生全書》

此書未見刊刻流傳，後人無法深究。梁鷓林即梁以樟。此書是王源與其兄王潔（1637–1691）一同合編而成的。

<sup>104</sup> 國家檔案局二處、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圖書館合編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一書也不見載有關王源《家譜》的資料。

<sup>105</sup> 呂履恆：〈王氏家譜序〉，載呂履恆：《冷古堂文集》，乾隆十五年（1750）呂憲曾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二〈序上〉，頁三四上至三五上。

<sup>106</sup> 〈張氏宗譜序〉，載《居業堂文集》，卷一五〈序四〉，頁六上。

<sup>107</sup> 〈家譜序〉，載同上注，卷一二〈序一〉，頁一一上至一一。呂履恆亦指出在王氏家譜中，始祖王玉後，「下三世失考，九傳至中齋公復其職」，強調「考據無徵，或詳或略，誠有不得已者」。他更讚賞此譜「義例謹嚴，可為譜牒之宗，使讀者慨然有尊祖敬宗之思，斯亦無憾於繼述矣」。見〈王氏家譜序〉，頁三四上至三五上。

順治十四年(1657)至康熙四年(1665)間，王源與王潔一同跟隨梁以樟學習。<sup>108</sup> 梁以樟乃明遺民，鼎革後隱居於寶應。期間，他結識了王源的父親王世德。<sup>109</sup> 由於王世德十分欣賞梁以樟的學問，故安排王潔、王源二子跟隨梁氏讀書，一直至梁氏逝世。由於他們感激梁以樟的教導，故當梁氏卒後，二人合力將梁以樟「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編為一書，共四十卷，取名《梁鷓林先生全書》，<sup>110</sup> 藉以表達他們對老師的敬意。

### 《顏習齋先生年譜》

王源和李塏均是顏元的弟子。自顏元卒後，李塏立刻展開編定顏元年譜的工作。康熙四十四年(1705)完成初稿後，他便將輯成的《顏習齋先生年譜》交給王源審訂。<sup>111</sup> 全書共分上、下二卷，主要參考顏元生前的《日記》及相關資料而成。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王源從事訂正《顏習齋先生年譜》的工作，<sup>112</sup> 不但「稱易體例」，而且「間有附益」。<sup>113</sup> 康熙四十六年(1707)，王源將《顏習齋先生年譜》付梓傳世。據李塏指出，王源審訂此譜，「實俾不逮」，故其貢獻不可忽視。<sup>114</sup> 陳祖武曾將《顏習齋先生年譜》點校出版，另定名為《顏元年譜》，於1992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版本和內容是一樣的，並附有校點者的〈點校說明〉，為研究顏元者提供很大的方便。

綜觀王源一生專注於經世實學事務，孜孜不倦地從事著述，成果不少，創見甚多，遺留下不少重要的著作，尤以經濟方面的主張對後人啟發良多，其影響絕不

<sup>108</sup> 〈先兄汲公處士行略〉，載《居業堂文集》，卷一八〈行狀〉，頁一七下；〈與梅耦長書〉，載《居業堂文集》，卷六〈書一〉，頁一六上；〈與李中孚先生書〉，頁八上；梅文鼎(1633-1721)：〈王先生八十壽序〉，載梅文鼎：《續學堂詩文鈔》(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98。

<sup>109</sup> 喬萊(1642-1694)：〈梁知縣以樟傳〉，載錢儀吉(1783-1850)：《碑傳集》，《清代碑傳全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一二三〈逸民上之上〉，頁618。

<sup>110</sup> 〈梁鷓林先生墓表〉，載《居業堂文集》，卷一八〈墓表〉，頁九上；〈先兄汲公處士行略〉，頁一八下。

<sup>111</sup>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載《居業堂文集》，卷一二〈序一〉，頁七下。

<sup>112</sup> 《顏習齋先生年譜》，「甲申(1704)七十歲」條，頁796。

<sup>113</sup> 《光緒順天府志》，卷一二五〈藝文志四·順天人著述三·國朝·顏先生年譜〉，頁6563；《光緒畿輔叢書》，卷一三四〈略八十九·藝文二·史部·顏習齋先生年譜〉，頁574。

<sup>114</sup> 李塏：〈凡例〉，載《顏習齋先生年譜》(《顏元集》本)，頁700。有關《顏習齋先生年譜》在編纂內容、體例等方面的優劣，詳參陳祖武：〈《顏習齋先生年譜》評議〉，《文獻》1986年第4期(1986年10月)，頁147-54。



能忽視。可惜他有不少著作沒有被後人妥善處理和收藏，最終散佚，令人遺憾。王源失意於仕途，遂寄情於著作，藉此抒發內心的感受和表達自己對未來社會的憧憬。另外，王源的興趣十分廣泛，醉心於軍事、地理、經學、文學等方面，且撰成專著，表達他的獨特見解，從而突顯其經世意念。本文的撰作，目的是系統地對王源著作的數量、版本、編刊等方面作一概括的考析，相信為以後研究王源的思想奠定基礎。至於各書的內容和學術意義，礙於篇幅關係，無法在此詳細交代，擬另撰文章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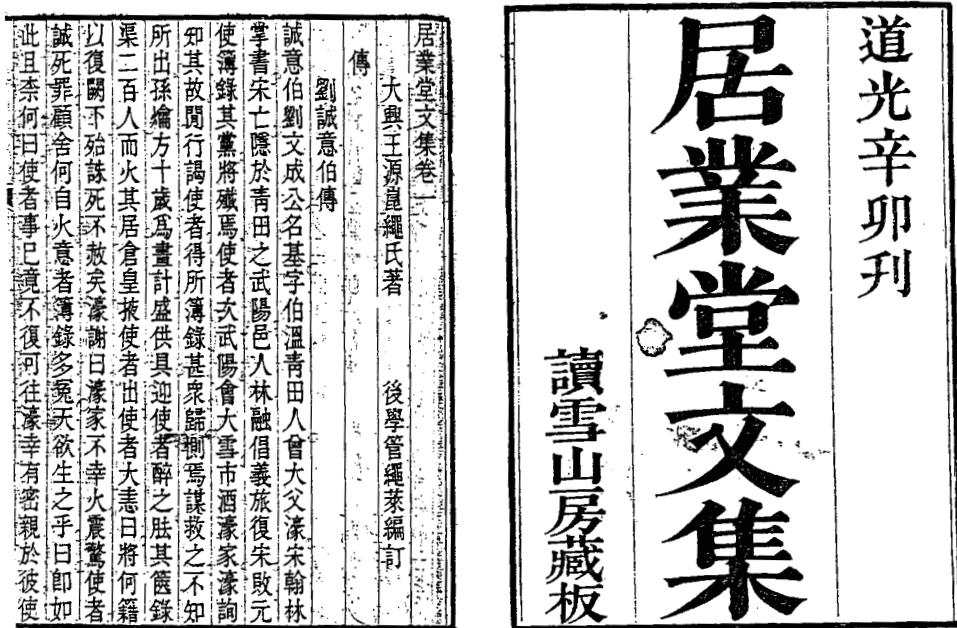
崔文翰

汪生傳  
 汪生，字德者，也。將死，為僧，死，飲以僧之服，執髮，被緇衣，蔬食十日，耳僧矣。王子曰：異哉！石堂和尚尚者，背原老人弟子也。石堂曰：生欲棄家從余游，余曰：止爾，有親，有室家，有子爾之事未盡也。烏乎！僧生躡踏久之，遂臥病，其父曰：吾見性至孝，讀書早慧，余以科名望之，兒不欲，欲為僧，余不忍，既病，涕泣謂余曰：兒無恨，恨不得養父，願從父乞為僧，余憐之，許焉。乃邀石堂就床上視其髮，兒叩頭喜，且泣，手髮授余，曰：兒今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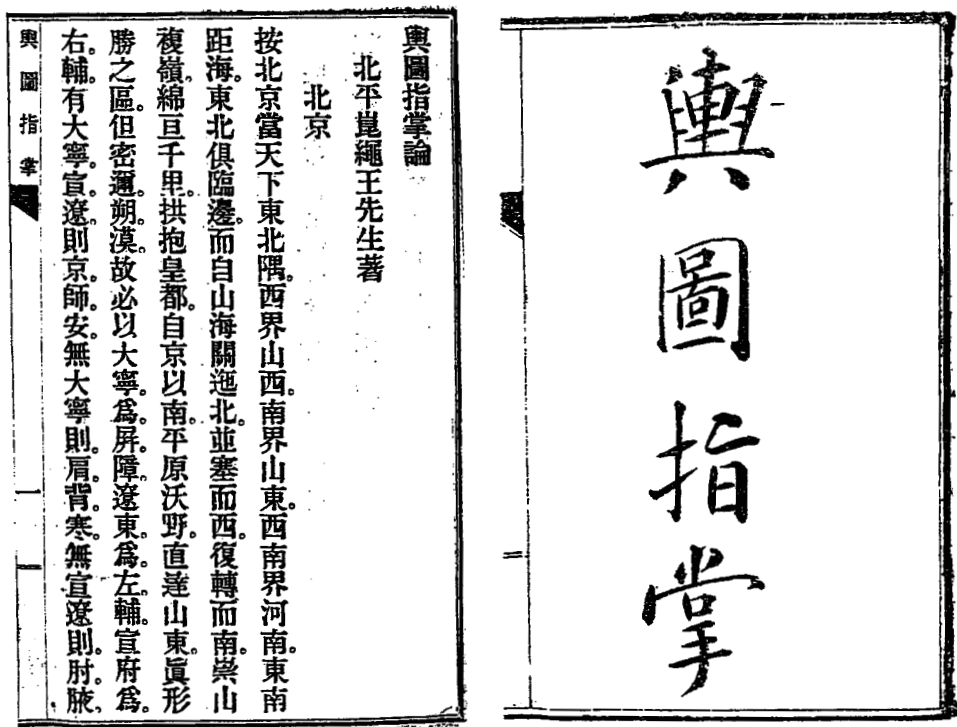
圖一：《王崑繩文集》初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康熙信芳齋刻本）

王崑繩文集卷之五 次刻  
 序上  
 陳靜機先生集序  
 子友高孔霖言陳堅侯閩中奇士，堅侯與黃叔威為婚姻，子交叔威久，孔霖言與叔威無異，則堅侯可知，而叔威又道堅侯尊人靜機先生，生平出其文集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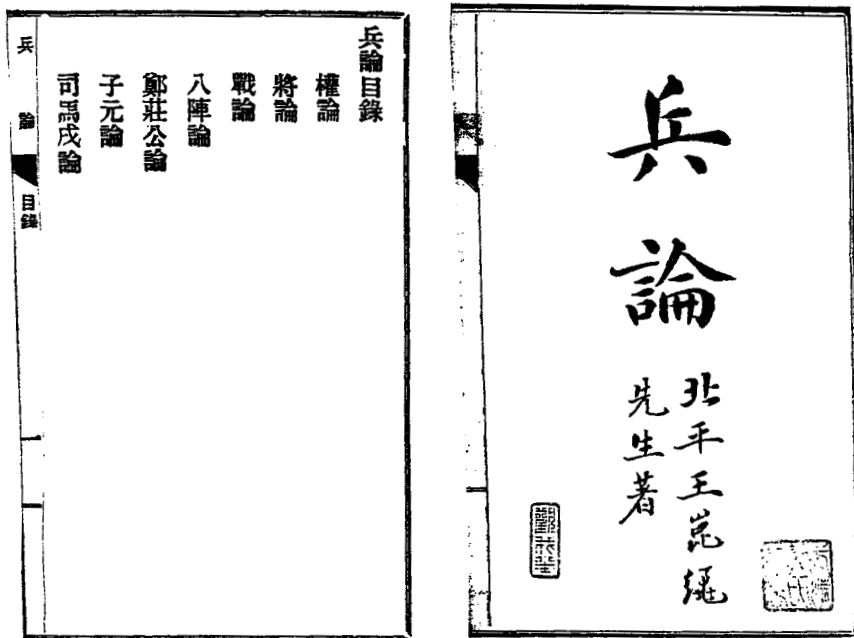
圖二：《王崑繩文集》次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康熙信芳齋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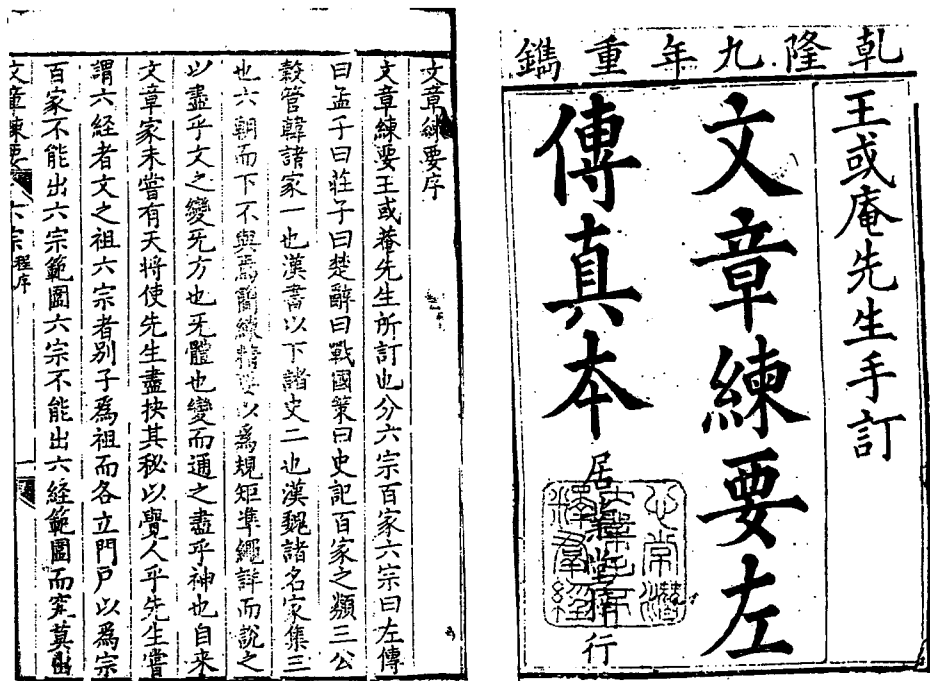
圖三：《居業堂文集》(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讀書山房藏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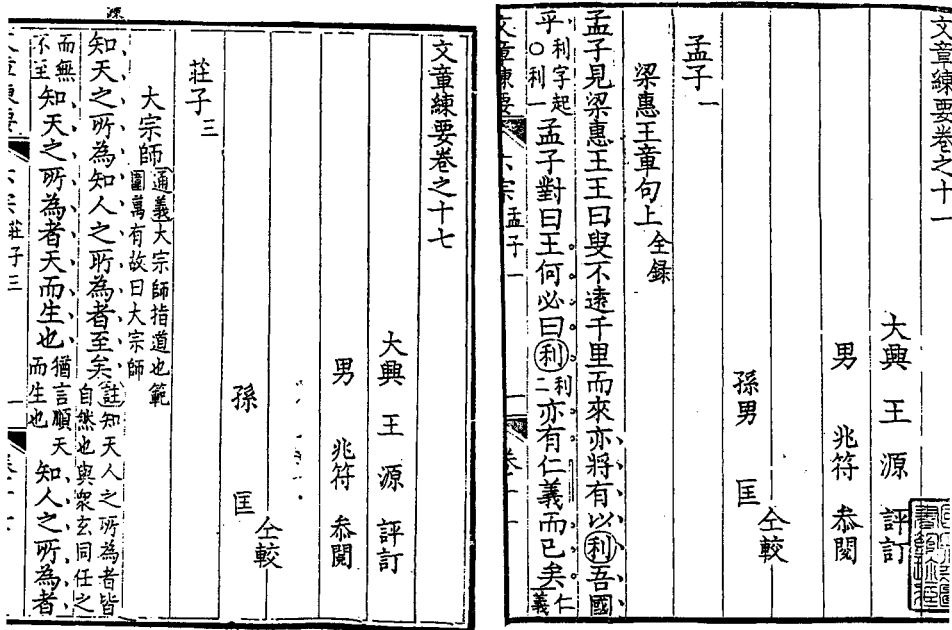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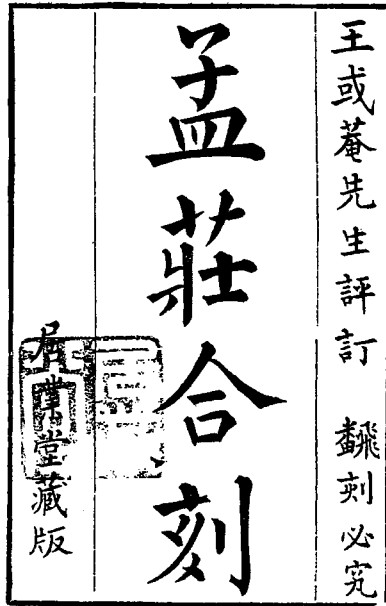
圖四：《輿圖指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鉛印本)



圖五：《兵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鉛印本)



圖六：《文章練要左傳真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九年〔1744〕重鑄本)



圖七：《孟莊合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雍正八年(1730)居業堂藏板本)

#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Writings of Wang Yuan

(A Summary)

Man-hon Tsui

Wang Yuan 王源 (1648–1710), one of the important intellectual figures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has not received much scholarly attention until recently. A prolific writer, he was interested in prose and poetry writing, statecraft ideas, historical study, military tactics, geography, classics, literature, and others. Since Wang Yuan was one of the disciples of the “School of Yan-Li” (*Yan-Li xuepai* 顏李學派), his writings can demonstrate the thought and scholarship of this school and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Qing period.

However,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taboo of the case of *Nanshan ji* 南山集, no systematic inventory of the works of Wang Yuan was made after his death.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his extant writing is always mistakenly underestimated while some of his lost works reported by scholars are still kept in various libraries in mainland China. They will be fully examined in this paper.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his works will be addressed, such as the number of his lost or extant manuscripts, the circulation and discrepancy of different editions of his writings and unpublished work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st of his writings.